

不忘初心，献身责任（三）

《海棠依旧》剧中一个细节画面一直让我深深为之震撼（直面现场实景的感受与阅读感受还真是大不一样）：邢台大地震时，周恩来赶到白家寨慰问受灾群众。当他发现群众面对寒风时，便立即让群众转过身去，自己则不顾北风刺骨，站在迎风一方对群众讲话。我读过《周恩来年谱》、《周恩来与他的世纪》等周恩来传记书籍，我知道，这不是电视剧的艺术虚构，而是一件邢台人民至今仍在传颂的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。

人们常说于细微处见精神。正是这类不经意、不做作的自然举动，才格外真实、深刻地表现出人民总理为关心人民、热爱人民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与责任。

栗战书主任在中办“七一”专题党课上的主讲报告中特别举了一个例子，“周恩来同志是严谨细致的典范，他一生养成了精益求精、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。现在保存着一张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报表，这张表上，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，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，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，批注数字70处，批注文字7处。郭沫若说，

周恩来‘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，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’。”

还有一件总理对自己实施问责的事情让我感慨万分。那是1973年6月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。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，亲自接见黎笋等越南党政领导。

黎笋向中共中央提出，越美双方虽然不久前在法国签署了巴黎协议，可是越南南方尚未解放，仍需中国提供大量的援助。周恩来则建议黎笋、范文同等人由他陪同前去延安，看一看当年中共在那里是如何身处艰苦环境而指挥全国抗战的。

在延安，周恩来带着黎笋和范文同等人参观了当年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的住地。抵达延安的当天中午，周恩来叮嘱当地领导准备一桌当地农家饭款待越南客人。在吃午饭前，周恩来把黎笋和范文同等人引到延安革命纪念馆，迎面便是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写给延安老区人民的一封信。周恩来通过译员向越南客人读了毛泽东的信：“继续团结一致，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。”

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黎笋、范文同等人说：“早在20年前，毛主席就指示我们首先在延安老区恢复战争的创伤，加强经济建设，可是我们做得很不够，很不够啊！同志们已经看到了，当年支持我们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的边区，现在的经济仍然不发达！只要看到这里的落后现状，我就感到难过！”周恩来的话让黎笋等人感到格外沉重。

傍晚的饭菜，还是农家饭。桌上的碟碟菜肴，都体现着当时延安老区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准：煮玉米、蒸土豆、炒辣椒、炖豆角，外加每人一碗南瓜汤。周恩来喝了一口南瓜汤，当众感叹说：“解放都这么多年了，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，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，我作为国务院总理，对此负有直接责任。今天，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。”

总理的责任担当让在场的陪同人员、当地干部群众为之肃然起敬，这件事毋庸置疑地表明，在人民总理那里，急人民之所急、想人民之所想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，而是已经渗透到情感、情绪直至无意识层面，成为一种本能地支配行为的严格标准。什么叫不忘初心、什么叫担当责任，从周恩来身上可以得到典范的回答。

如果说，世界上真有不知疲倦的人，那么，周恩来就是一个。他被外国人称为“全天候总理”。周恩来患病之后最精彩的生命乐章是他住院前的近两年时间，即1972年5月发现癌细胞到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这700多天。如果是普通人，知道自己患癌症，第一个反应该是赶紧检查治病，可是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，知道自己患癌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开展“批林整风”，让“文革”的左倾步伐慢下来。他用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高度——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能落到“四人帮”手里！

他知道，党和国家的政治“肌体”不能因为他的空位而留下难以弥补的“疤痕”，国务院总理人选与权力移交将成为他生命

中一项重要的“工作”。在病情日益加重之时，他几乎是和病魔赛跑，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平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。

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，党的希望就多一分。因为人民正在觉醒，弥留之际，当他清醒过来时，对叶帅和身边的人员说：“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，中央让我活几天，我就活几天！”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。

一件件国事，一桩桩大事，一起起外事，他都亲力亲为，尽善尽美，努力维持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人民生活在“文革”期间能正常运转。精神上的忍辱负重，身体上的病痛折磨，成为周恩来最后三年多的生命主题。

最近微信上有篇文章很火，标题是“周恩来谢幕之年为北京做了些什么”。文章说，1973年夏季之后，中国政局进入了复杂微妙的拉锯战，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竭力反极左思潮的一系列举措遭到拦阻，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。但在8月底党的十大召开前后，周恩来连续发出几条重要指示，却在北京市掀起一番少有的检查督促浪潮。

周恩来针对北京市下达的工作指示，主要围绕首都社会治安、交通秩序、财贸服务等专题，分别在该年7月初、8月25日、9月6日，从现有开放的档案查看，均没有公布指示的具体文字内容。这些指示在北京市贯彻力度很大，波及面甚广，产生较大的垂直效应。

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，还要筹备四届人大，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，接待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。周恩来对北京的软硬件

建设不甚放心，亲自主抓这些工作。北京市委于7月4日召开动员大会。7月23日至25日抽调170多名干部，由各大组、委负责人带队，分赴东城、西城等五个城区检查。市委办事组据此报告说：“各区委和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很重视，广大群众对全国和首都的大好形势，感到欢欣鼓舞，认识到搞好首都的社会治安、交通安全、改进服务态度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反映了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，关系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。”

文革中，由于工作重点的偏移和管理水平下降，北京的城市面貌日益显现粗鄙化，市容建设严重滞后。周恩来看到的一件材料中称，北京的不少城区居民和干部在宿舍养家禽家畜，有碍城市卫生。根据总理指示，市委7月31日通知要求“城区和使馆附近地区以及吃商品粮的居民户一律不准养鸡、养鸭、养鸽、养狗、养猪等”。当时，首都生活用品供应紧张，中心街区许多居民趁管理松懈，纷纷在自家院落中饲养鸡鸭，在房顶搭建鸽笼，个别大胆的甚至圈养猪仔。在使馆区，能听见鸡鸣声，看见草丛里私养的鸡鸭群和随处遗留的动物粪便，外电对此时有报道。

收到周恩来的指示后，北京市马上组织基层部门下基层检查，统计结果让人大为吃惊，在八个城近郊区的居民户中，饲养家禽家畜高达21万多只。市委当即以强硬的手段处理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，总算在国庆前夕，城区范围已处理16万只家禽家畜。剩下的5万多只属于难啃的钉子户，区及街道一时难以“消化”，这也让市委领导头疼不已。反而是平民居住较多的崇

文区进展较快，已处理的家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，市委、市革委会特地通报表扬。

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开幕，会期五天。8月25日至9月6日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，与十大在时间上有重合。两个重大活动叠加，让周恩来格外谨慎。8月25日上午，在繁忙的会务之中，他突然对北京市做出进行一次安全和防火、防盗、防特以及服务态度、卫生工作大检查的指示。

北京市委上午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，没有一丝拖延，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。在市委大会议室，从十大会场临时回来的吴忠、万里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精神，指示内容较为简单，也就是概括性的几句话，对于四处赶来的各单位负责人来说，传达时间之短，出乎他们意料。吴忠、万里要求把总理的指示连夜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。

周恩来8月25日下达指示后，一座日常管束严厉、夜晚近乎静谧的城市在数小时之内沸腾起来。动员人数最多的当属东城区，当晚共出动居民46000多人，清扫了60多条大街和100多条胡同。朝阳区当晚从各单位抽调2100多名工人民兵，上街巡逻值勤。北京饭店洗衣厂连夜洗毛巾、床单、工作服等7000多件。东、西两个城区饮食、副食行业12000多名职工，进行了室内外大扫除，整顿了菜摊、水果摊。百货行业广大职工，连夜摆布商品，做到丰满整齐。

1973年10月下旬，朝鲜“鸭绿江”女子篮球队应公安部邀请来访，在北京与中国女篮进行了三场比赛，在一两个场次中出

现了部分观众鼓倒掌的情况。周恩来颇为不快，批评赛场组织措施不力，并指示再比赛一场进行弥补。

市委 11 月 10 日召开相关会议，承认“事先对观众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深入”，“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”。恰好朝鲜“鸭绿江”女子篮球队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后返回北京，经国家体委出面协商，11 月 29 日同北京女篮补办一场比赛。

按照预案，各单位挑选政治表现和组织纪律性较好的群众出席观看，做到定单位、定人、定座位。比赛的当天，将周总理的批示向观看比赛的群众再次作了传达，国家体委还在现场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做到“一鼓四不鼓”（即进球鼓掌，错判、误判不鼓掌，运动员动作粗野不鼓掌，运动员犯规或罚下场不鼓掌，场上发生争论不鼓掌），结果秩序大好，“全场观众自始至终为双方、特别是为朝鲜战友的精湛球艺不断热烈鼓掌，没有出现倒掌等不礼貌行为以及擅自走动、迟到早退等现象。”

文章最后说，周恩来当时处在政治上最为困难的时候，政治局的围攻还未结束，心力交瘁，使他的这些指示抹上无尽的悲情。1974 年之后他已无力支撑病体，“总理指示”字眼已难于见到。可以这样说，1973 年是周恩来拼搏一生的实际谢幕年，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绝唱，蕴含他的不甘和不舍，也隐藏着个人与国家的难堪和凄楚。

栗战书主任还在中办“七一”专题党课上的主讲报告中深情提到，“周恩来同志的一生，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，有时甚至超过 18 个小时。1972 年周恩来患病以后，只要身体尚能

支持，他就坚持工作。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共做了大小13次手术，平均40天左右一次，到1975年6月，他的体重只剩下30.5公斤。这期间，除了批阅、处理文件外，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就有161次，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，会见外宾63批，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，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，出医院开会20次，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。周恩来同志的这种精神，就是共产党人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！”

《海棠依旧》全剧结尾处，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安排身后事：撒骨灰的时间不要太久，飞机起落一次要费很多汽油，骨灰不要撒到有人烟的地方。

在生命垂危之际，周恩来一边喘气，一边对医疗组长吴阶平说：“我这里没事了，你们去照顾别的同志吧！”这是他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从年少时“吾将公之天下，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”的初心和理想，到生命最后时刻的心中只有别人，没有自己的嘱托和交待，总理的大公无私、人民至上的信念和责任已经渗透到他的骨子里，融化在他的血液中，成为了他的思维、心理、身体以及这辈子精彩人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因此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恪尽职守，献身责任”这样的评价之语，对于周恩来说，当属受之无愧！

有人说，总理生前从来没有自己，死后当然也无须保留自己。
活着时不忘初心，恪尽职守，献身责任，奋斗终生，长眠时不留
骨灰，回归自然，融入大海，化为青山。
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。